

# 发展规划简报

华侨大学发展规划处 编

第167期

华大报字(部)04号

2016年6月6日

- 【高教动态】※李克强:以深化改革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
  - ※李克强:用最短时间让科研人员分享到政策红利
- 【高教观察】※智库评价要考察其调研质量
- 【专家视点】※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
  -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聚焦“数字化时代的大学未来”
- 【校内传真】※我校17位教师入选省级人才项目
  - ※“经典诠释与政治哲学”2016年全国博士后论坛在我校举办
  - ※我校学子在多项赛事中获佳绩

## 【高教动态】

### 李克强:以深化改革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

5月30日下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主持会议。

李克强说,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等方面的明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创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有许多遥遥领先的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贡献巨大。但后来由于多

种原因，我国屡次与世界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全面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开启了全面创新的时代。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两院院士创造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也功不可没。

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和交互影响，创新既是我国实现“双中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使创新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李克强强调，要落实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一是补好基础研究短板。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到2020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5%，组建国家实验室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主力军作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性，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二是突破应用研究产业化瓶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部署推进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形成一批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新产业领域和经济增长点。三是大力推动协同创新。依托互联网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等创新主体协同，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协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以及区域创新协同，加速释放创新潜能，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李克强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

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完善保障和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解决“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改进科研活动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

马凯、刘延东、孙政才、汪洋、胡春华、陈竺、杨洁篪、郭声琨、周强、曹建明、韩启德、万钢、周小川和路甬祥、陈至立、桑国卫、宋健、徐匡迪、王志珍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会议代表，两院院士大会会议代表，中国科协九大会议代表等参加会议。（来源：《人民日报》）

## **李克强:用最短时间让科研人员分享到政策红利**

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引发全场科研人员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两天后的6月1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相关措施，就摆上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桌。

“我注意到，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掌声，是从后排首先响起来，然后传到前排的。因为后排坐的都是科研人员啊！”李克强总理在常务会上说，“科研人员给我们鼓掌，一方面是表示拥护，但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寄予更大的期望。期望我们‘讲到了’也要‘做得到’，真正把好政策好措施落到实处！”

**一流科研机构、一流高校、一流科技成果从来不是靠政府部门“管”出来的！**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讲话中，李克强总理举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一所高校要建一个实验室，结果提交申请后，这个部门说要盖两

层楼，那个部门说只能盖一层楼，让这所高校无所适从。

而在6月1日的常务会议上，来自不同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也讲述到他们遇到的政策制约：邀请院士评审每天的差旅费，不够一间单独标准间的费用，只能两名院士合住；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来华参加会议，每日的差旅费标准不能超过800元人民币。

“政府部门对科研的管理也忒细了，简直是‘天网恢恢、无一疏漏’啊！”李克强说，“所以，一定要给高校和科研院所必要的自主权，大力解除对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的束缚。”

当天会议决定，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合理扩大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基建项目自主权；科研人员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可根据工作需要，合理研究制定差旅费管理办法，确定业务性会议规模和开支标准等。

“我在科技创新大会上讲了，一流科研机构、一流高校、一流科技成果从来不是靠政府部门‘管’出来的！必须进一步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更大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李克强说。

### **提高人员费用的比例，就是承认人才和智力劳动的价值**

李克强总理对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部署，可以追溯到一个多月前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考察。当时，总理在两所高校的不同院系考察科研经费的使用政策，尤其是“人员费”的比例限制。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负责人说，基础数学的研究经费，“人员费”的比例只占30%。

“这管什么用？纯数学它用不了多少设备，主要就是靠大脑，这不是逼着他们不搞纯数学，不坐‘冷板凳’吗？”李克强在当天晚些时候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说。

也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总理向参会的几十所高校负责人作出承诺：要调整科研经费使用政策，更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6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增加间接费用

比重，用于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最高可从原来的 5% 提高到 20%，对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及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可按规定标准开支劳务费。

“提高人员费用的比例，就是承认人才和智力劳动的价值。”李克强说，“‘人’是我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把‘人’的力量调动起来推进创新，就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 **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负责人也列席了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两天院士们都在说，对总书记、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满意，唯一的担心就是落实有困难。结果今天政策就出来了！”一位高校负责人说。

“你的发言很客气，但里面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就是对政策落实和下一步改革还有更高的期待，这是大实话啊！”总理一席话，引发会场的一片笑声。

李克强说，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措施，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不能光出个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要切实解决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各部门要自我改革，直接修改完善具体的文件细则，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口惠实也至，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来源：华声在线）

## **【高教观察】**

### **智库评价要考察其调研质量**

突出调研质量对智库评价的作用，是在智库评价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特色的必经之途。衡量中国智库的水平与实效，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智库调研是对中国国情、民

情和社情的深入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新思想、新理念与新方法，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新课题，建立对智库的评价体系同样是一个新课题，而把调研纳入智库评价体系，更是一个新的尝试。近日，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巡视员张学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调研对智库发展极其重要，智库评价不能忽视对其调研质量的考察。

### **调研是智库生产链的重要一环**

调研体现了实证研究的导向，它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和“身体力行”两大优良学风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智库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学森认为，智库的本质属性和存在价值就是要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这一功能能否实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决策方的因素，也有咨询建议方的因素，还牵涉到两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机制，但最基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这些决策和咨询建议本身的科学性。科学性由三种途径而来，分别是正确的理论、间接经验和亲身实践，但三者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智库必须走出书斋，到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线上、实践中和生活中去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在决策咨询工作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建议权。因此，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调研，全面掌握某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智库才有可能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供决策方选择。《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作为智库的基本标准之一，强调增强智库的调查功能，这是对智库评价的战略引导。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通过考察智库调研质量的高低来评估智库的实际水平。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成功的调研活动能为智库研究提供现实问题的分析依据，增强智库研究的

科学性，完善智库研究方法，夯实智库研究基础。智库研究成果都是从现实出发，旨在解决某个或某类具体现实问题而开展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分析几乎是所有智库研究的特色。

“智库是思想与智力产品的生产者，全面地评价一个智库，不仅要看看其终端产品，也要监督其生产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调研是智库生产链的重要一环，在对智库进行评价时应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同时，智库调研质量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衡量，这有利于减少评价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评价体系更趋公正、规范、合理。

在谈到调研质量对我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时，受访专家一致表示，突出调研质量对智库评价的作用，是在智库评价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特色的必经之途。衡量中国智库的水平与实效，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智库调研是对中国国情、民情和社情的深入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新思想、新理念与新方法，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此，把调研质量作为智库评价的重要标准，有助于在智库评估领域树立中国标准、发出中国声音，拓宽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发展之路，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 **调研质量不精制约智库长远发展**

随着国内智库建设渐成热潮，智库调研活动日益频繁，目前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调查成果。但总体上看，智库调研工作与决策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黄海注意到，目前国内重点智库对调研的投入量有所增加，调研方法的科学性明显提升，但仍有很大改进空间。相对而言，部分一般智库由于学术积淀不深，调研投入不足，调研方法不创新，研究成果容易出现自说自话、泛泛而谈的情况。在其与政府的实际互动中，往往出现一边是智库研究“硕果累累”，一边却是政府决策急需科学根据的矛盾现象。

对于当前智库调研质量存在的问题，文军认为主要表现在调研的粗浅、

零散和短期化上。据他介绍，国内智库在调研活动方面各不相同，有些是建有专门的调查中心负责为智库研究提供基础性的调研成果；有些是依托自己已有的各项课题和研究项目展开智库研究，将课题成果直接转化为智库成果；还有一些通过与专门的调查机构或数据库合作，利用其调查数据来开展智库研究。“总的说来，国内智库在调研方面投入不足，已有的一些调研也基本上是停留在碎片化的阶段，临时性、应急性导向的调研较多，长效化、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调研活动相对比较缺乏，调研方法的科学性也有待增强。”

从长远来看，调研工作质量的短板会制约中国智库的发展，阻碍智库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表示，我国智库调研质量总体水平偏低，这与我国发展势头极不相称。“我们要树立中国学术的话语权，但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以他国学术资源为依据，没有自己扎实的调查以及深刻的理论分析，那么话语权又从何而来？”徐勇认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世界性大国必定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服务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展全面深入持续的调查，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对中国智库而言，要做到这一点，须强化调研质量对智库评价的导向作用，带动智库研究人员沉潜下去认真做功课。

### **智库调研为学术考察和政府调研搭建沟通桥梁**

现代智库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知识、信息、理论与方法，向决策者建言献策，以期得到采纳并产生社会影响。智库机构的这种职能决定了智库调研有其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与学术考察及政府调研既有明显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衡量智库调研质量，应当对智库调研模式的特点及其与学术考察、政府调研的关系有清楚的认识。

智库调研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考察与政府调研。黄海认为，学术考察特别是基础学科的学术考察更侧重对学术理论脉络和逻辑的梳理，即“文献

中的田野考察”，理论走出“象牙塔”并直接应用于实际并非其硬性要求。政府部门调研则多数具有即时性的特征，更注重当前问题的即时解决。从目的上来说，智库调研与以上两者都不同，相比于学术考察，智库调研不是为了建立或充实某个学科，而是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并且其调研结果不能止步于发现问题和表达批评意见，更应致力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影响决策者和公众的认知。相比于政府调研，智库调研往往专注于某个或某类问题，注重成果的长期性、战略性，不仅出主意，还要出思想；不仅要对政策作出正确的阐释，更要作出战略性、前瞻性的分析。从方法上看，政府调研多采用座谈、实地考察、收集资料等常规方法。智库调研除了上述常规方法之外，还多采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无结构访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建构等方法。

关于智库调研与学术考察、政府调研的不同之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副研究员常文磊表示，前者比后两者更强调独立性。他认为，科学的独立思考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这种独立性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也不是超出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去另起炉灶，而是指智库要在大局意识的指导之下，加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智库调研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利益与思想两个层面。在利益关系层面，为保证调研活动按照自身规划正常进行，智库一般会与其他主体保持相对距离，尽可能摆脱日常琐事和利益关系的干扰，从而对某些现实问题进行远距离的审视、分析、考察、判断并得出自身的结论，提出相关的建议。在思想层面，智库的独立性表现为基于现实的创新性。由于现实问题千头万绪，现代社会中各种客观因素又瞬息万变，智库调研欲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就不能从教条出发，而是要不怀成见、实事求是，在每一次调研过程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视野的拓展和思想的创新。相比之下，一般性的学术考察虽也强调独立思考，但要跳出已有学理的窠臼则更难，因其离变动不居的现实社会相对较远，没有智库调研那么充足的活力源泉以滋养新思想的生长。

学术考察往往要以学术史为依据，但智库调研则更多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不必拘泥陈迹。而政府调研活动则主要是为了落实上级政府或部门的某项任务，或者是到下属的单位去看看某项任务的落实情况而进行的现场调查，其本质是政府为了履行公共职能而直接投入其中的行政活动。智库调研有可能是为了完成政府的某项委托，但其活动的自主性更大，其履行的是智库自身公共职能而不是政府职能。

智库调研虽然与学术考察及政府调研都有明显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智库调研从二者身上汲取资源，同时又起到一个联结的纽带作用。就学术考察对智库调研的作用而言，前者给后者以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支持。常文磊说：“学术考察深究学理，系统地梳理学科知识，智库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利用学术发现去阐释、解决现实问题。”对此，文军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学术考察是探索、发现或检验各学科研究对象具体发展规律的活动，其成果为智库调研提供了学理支持。就政府调研来说，其所面对的是比智库调研更多样、更细碎、更繁重的实际问题，因此形成了较为高效的工作模式和流程，这为智库调研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同时，政府调研中发现的带有结构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又为智库调研提供了重点对象。

智库调研从学术考察成果和政府调研活动中吸收理论资源与工作经验，寻找灵感与突破点，这种模式可以兼容学术考察与政府调研的优点，并且为两者的沟通搭建了桥梁。正如徐勇所说，一方面，“智库调研将学术成果运用于现实，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现实参照”；另一方面，“智库调研将学理融入调研成果，然后反馈给政府，扩大了后者的理论视野”。

### **多角度衡量智库调研质量**

由于智库调研质量的重要性及其调研模式的独特性，只有找准影响智库调研质量的各种因素，才能从调研质量看出智库的真实水平。文军告诉记者，把调研质量纳入到国内智库评价体系之中，可以把是否建有自己独

立的调研基地和数据库、是否拥有专业的调查队伍和经费投入、是否有一套规范化的调研程序和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对调研成果的运用及其实际效果情况等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这些环节和指标都是衡量调研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其是否能够最终转换为智库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调研成果的质量也是智库研究成果质量的主要标志。”

“考察智库调研质量和水平，特别是考察大型、高端智库的调研质量和水平，可以把调研基地平台建设以及调研规模两个因素考虑进去。”张学森结合中央党校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经验，探讨了衡量智库调研质量的思路。他说，中央党校着重加强信息平台 and 调研基地平台建设，把调整与优化中央党校调研基地布局摆在突出位置，在全国各地遴选了一批代表性强、结构合理的调研基地。同时，强化“寒暑假双假调研制度”，利用假期开展大规模集中调研。

对于如何衡量智库调研质量问题，常文磊则认为，智库调研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从调研的过程入手进行思考。“一是调研的目标。包括：目标制定是否合理；调研的价值设定是否科学；调研对象的选择是否恰当；调研目的的表述是否符合规范、遵循伦理道德。二是调研的操作技术。主要包括：问卷与访谈提纲的设计、编写是否合理；调研的目标群体选择是否准确、科学；调研的实施过程是否科学，程序是否规范；调研过程是否合乎伦理规范，是否严格保护了组织的秘密与个人的隐私；调研的问卷发放数量、回收率、访谈的成功比例是否适当；调研原始材料的编码、加工是否合乎规范，等等。三是调研成果及其转化运用情况。主要包括：调研的目标达成度如何；调研报告的归纳、提炼、升华情况如何；调研对智库自身体制机制、文化、组织等方面建设的改进发挥的作用如何，例如是否物化为某些规章制度或者研究工作规范、条例；有关部门对智库调研成果的反馈、运用等情况；调研结论被相关部门的采纳情况；调研结论转化为政策、法律等情况。”

除了调研过程之外，姚洋认为，还可以从调研方式上考察调研质量。他指出，可以从功能角度将智库调研分为印证式、解读式与全面分析式三种，三者 in 智库评价系统中所占权重应该是不一样的。印证式调研，即为验证一个推论，专门去实地看一看，形成丰富的感性印象，以验证初始判断是否准确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这种调研方式较为简单，所占权重不应太高。解读式调研，即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解剖麻雀”，见微知著，追本溯源，归纳微观现象所反映出的宏观问题。这种调研所占权重应当高一些。全面分析式的调研，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大量调研数据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处理，对某一方面的战略性问题作系统的、透彻的研究。这种调研对智库软件和硬件的要求都很高，故应占最大权重。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姚洋告诉记者：“调研质量是评判智库优劣的试金石，但如何对调研质量进行合理的衡量，要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专家视点】

### 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

**编者按：**近年来，“智库热”如同席卷全国的一把火，既点燃了各类研究机构为国家决策贡献力量的热情，也助推了优秀资政成果的涌现。但智库“热”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与隐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智库建设进行了专门论述，肯定了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当前智库界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反躬自省方能行稳致远。智库建设如何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怪圈，避免形式主义？智库研究如何退去虚热、务求实效？我们今天特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为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开出良方。

## 1. 如何看待“智库热”的积极作用与深层隐忧？

**主持人：**从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至今，不到一年半时间。智库建设的业绩有目共睹，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也逐渐浮现。有声音认为，当前的智库热虽然可喜，但已显出“库多智少”“一窝蜂”“鱼龙混杂”的苗头，若不加注意，易于陷入“虚热”之中。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当前智库建设中的确有无序增长的苗头：有很多新智库涌现，也有很多其他机构改换“马甲”变成智库。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但需要引起重视。因为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解决，有强大的政策研究需求，需要更多智库辅助决策。但如果鱼龙混杂，很多不是真正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都挤进来，特别是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咨询公司或者“赚眼球”的传媒机构也都自称智库，就可能误导社会各界，最后使智库作为一类社会组织被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所误解。因此，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应该通力合作，向社会更加清晰地说明智库的门槛和标准，提高全社会的鉴别力。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的确，如今一些智库并非真正的智库。《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我们首先应依据《意见》提出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资金来源、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等八项基本标准来辨析当下各类机构是否属于智库。同时，应该大力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发展，加强不同智库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多选择和优化的机会。

**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副所长、研究员）：和担忧智库“过热”相比，我倒是认为：当前，中国智库队伍建设仍需要不断壮大。我国智库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要求差距仍然很大，整体发展滞

后，既缺乏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也缺乏高水平的智库队伍建设。现在，我国智库队伍建设刚刚起了个头，各级各类智库队伍迫切需要不断发展壮大。在事物发展的前期阶段，与其惊呼“虚火旺”“一窝蜂”，不如加强智库建设管理，及时做好引导、规范和支持工作，在智库体制机制建设、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上不断提高水平，努力把智库建设引导到为决策服务的道路上去。

**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教授）：我赞成。中办、国办《意见》引发了如此高的“响应度”，为什么？首先，《意见》激发了战略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的行业意识觉醒、自我专业认同。很多此类机构本就存在于政府内或大学里，现在这些机构都用“智库”命名自己，才让大家感觉到忽然之间多了这么多智库。其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向来区别并不严格，不少机构也是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锅煮”，因此很难说政策研究机构是智库，其他偏向理论研究的机构就不能算智库。最后，以往知识界建言献策的渠道并不畅通，也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意见》从制度层面确定了智库作为建言献策的法定渠道，大家当然愿意贴上智库的标签，为自己的建言献策提供合法性。这倒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体现。

但是，“虚火旺”也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对智库性质和功能的认知流于表面。至于一些咨询公司浑水摸鱼，号称智库，那就纯粹是商业炒作。要坚持智库的公益和非营利定位，智库界要明确把咨询公司排除在外，不能无限扩大智库的外延。

## **2. 智库建立或转型应以什么为标准？**

**主持人**：智库热的一大表现，是近两年内新建智库、转型为智库的研究机构大量涌现。既然建立智库是必然且应该的，那么我们就得首先厘清一个问题：决定是否有必要建立某智库，或者决定某机构是否要智库化转型的关键标准是什么。

**薛澜：**转不转型为智库、如何转型，关键要看一个机构的使命定位与政策研究需求的契合度。首先，不同社会组织都有其各自的使命定位，智库的使命定位就是在所选择的领域从事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这样的领域一定要有重大而持久的决策需求，如创新治理、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医药卫生等领域。新智库要瞄准新方向，老智库要在传统领域推陈出新，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展新思路。同时，新老智库都应注意不要跟风。政策研究也是有市场的，有的研究领域非常热、竞争激烈，有的研究领域比较冷，尚无人占领。新智库确定研究领域时，应审慎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跟现有智库错位发展，以避免资源浪费。

**王辉耀：**最关键要看智库自身的研究定位。研究定位是智库研究的起点和方向。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相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我称之为“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智库首先要选择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领域，然后要坚持不懈地精心耕作，力求在这些重点领域取得核心竞争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李国强：**说到转型，我认为促进官方智库转型发展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为官方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占主体地位，但大多数官方智库功能单一、研究领域和研究组织形式单一、研究视野封闭偏窄、管理方式僵化、研究内容和研究机构碎片化、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单一，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近两年来，官方智库在转型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有不少是花样文章，没有深入研究并自觉遵循智库建设和管理规律，缺乏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因此，亟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鞭策和激励官方智库率先推进内部转型，尤其不要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去。

**李刚：**规范智库建设有两条路径，一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审批制”。这样做表面上会使得智库发展很有序，但能不能催生一批代

表中国软实力的世界一流智库？我持怀疑态度。二是把智库放到学术市场、国际政策市场里去竞争，历经 10 年 8 年的大浪淘沙，一批佼佼者能坚持下来，有稳定的资金、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政府建立了良性互动，有政策需求，有国际影响，这就是有生命力的智库。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该对智库撒手不管。不搞审批制，但有必要建立智库“登记制”。智库是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公益机构，应享受免税待遇。美国智库的免税待遇来自税法的 501（C）（3）条款，凡是享受了待遇的机构，每年必须如实填写 990 表格，把自己的基本数据如实申报，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接受公众监督。我国如果采取这种登记制，一方面可以把混进智库的营利机构排除出去，另一方面，通过申报的基本信息，每年国家就可自动掌握智库的准确数量和基本情况。

另外，导致智库界虚火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和省市地方的智库治理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中央层面的智库治理需要在合规性管理、资金募集、免税待遇、人力资源等问题上提供全国性的系列规范文件，提高制度供给效率。

### 3. 什么才是高质量的、真正的“智库论坛”？

**主持人：**总书记指出，现在一些智库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在我们看来，这些形式是需要的，但必须同增强研究能力、提升研究质量结合起来，互为促进。换言之，智库办论坛，必须考虑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相统一。

**李刚：**总书记向来主张做事要滴水穿石、抓铁有痕。这个指导思想对智库界同样适用。智库界应该通过艰苦的数据积累、案例积累、分析范式积累进行长期建设。这种长期积累需要长线投资，短时间看不到成绩，而且很难坚持。“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则不同，只要有钱，办起来不难，影响大、成绩看得见。对于急于出名的智库而言，办论坛自然是最佳选择。但很多水平不高的论坛对提升公共政策分析质量没有多大好处。

论坛作为智库的一种常见活动，主要功能是政策研制成果的发布和宣传，属于“出口”。当智库自身并没有研究成果时，智库论坛也只能是找别人来装点门面，实际上和举办活动的智库自身关系不大。

同时，媒体在智库传播方面也要更加理性。对决策过程时间分配而言，决策前调研占90%，决策占9%，发布宣传只占1%，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媒体不能只热衷于报道台上一分钟，而对台下十年功不加关注。

**薛澜：**政策研究当然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和政策研讨，但是这种交流必须以实质的研究内容作为基础，同时也应注意目的与形式的有机结合。有的论坛注重学术交流和观点交锋，通过理性的探讨和辩论，使得问题更加明确，观点更加鲜明，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完善。这样的讨论往往不需要太大的排场，更多的是需要研究者和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另外一些论坛注重的是政策沟通，通过举办论坛，把比较成型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和公众发布，这样的论坛往往需要在形式上更加生动活泼，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如果不论目的如何，一律是高大上讲排场的“高端论坛”，这样的论坛浪费时间和财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李国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智库论坛应予以限制。论坛、研讨会是智库影响舆论、启迪民众、建立智库品牌、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总书记指出的这些问题，其重要根源在于商业化、功利化，追逐名利。对于此类打着智库旗号举办的活动，应该按有关规定严格管理并促使其提高质量。

**王辉耀：**专业的论坛对智库研究有推动作用，但论坛的设置和智库本身有密切关联。真正的智库论坛，一定是围绕智库定位举行。会前首先要对当下的宏微观环境和来自政策部门、企业界、专家学者的相关政策需求进行详细研究分析，创造性地选择、拟定合适的主题和议题，邀请恰当的人选，进行专业、深入、全面的讨论交流。与会者在活动中交流思想、碰撞智慧，激发出大量对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的观点。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

定向、集中调查研究的渠道，为建言献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通过公共传播还可以启迪民智、影响舆论。这样就使智库兼顾了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的统一。

例如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每年有 200 多场活动，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场思想风暴，其座右铭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其中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高质量的论坛或圆桌研讨。同时国际上的知名智库也通过论坛的形式提出话题，影响国际相关领域的议题设置，进而影响国际舆论。

#### 4. 怎样用好智库评价与排名的“双刃剑”？

**主持人：**智库建设要“去虚火，强筋骨”，重要一环是对智库进行科学的评估。智库评价评估也是智库管理的有效工具。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在今天的中国智库界逐渐成为重要议题。但怎样科学制定评价体系，又如何合理使用这一工具？业界尚未达成一致。

**王辉耀：**对智库进行排名有其积极意义，有利于不同智库科学认识自身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自身研究质量，共同促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但是，应当避免一拥而上、重复泛滥的智库评价排名，特别是要避免智库、咨询公司等相关机构进行智库排名，防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产生，影响评价公信力。

对智库的评价，应该由针对智库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第三方角度进行，科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审流程，保证评价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以真实反映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并系统总结评价结果，针对性地提出智库发展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李刚：**智库排名是智库评估的一种形式和方法，绝不是全部。国际上智库评估有多种方法，比如美国智库管理界名家斯特鲁伊克就主张多做单个的智库数据积累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改善智库管理和政策研究。现在，一些人把智库排名等于智库评估，甚至把智库排名看成一种话语权，无形

中把智库排名这种工具异化了。

智库排名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首先要有理论积累，其次要有数据积累。美国第一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诞生于 1916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首发于 2007 年，两者之间相差 91 年。也就是说，美国经过 90 多年积淀，才出现一个著名的智库排行榜。我国大规模智库建设才两三年，还没有一定时间的积淀，对其进行排名意义有限，不如多做一些旨在提高管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评估工作。

**薛澜：**智库排名是把“双刃剑”，如果是在认真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做排名，可以做到以评促建，推动智库良性发展。反之，在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东拼西凑一些数据就搞排名，很可能对社会产生误导，对智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有些智库排名把大学或科学院当做一个基本单位来进行评比，是不妥的。还有一些智库评比，不关注智库的研究质量，而把智库的社会曝光度作为主要指标，只会把智库发展引向华而不实的歪路。所以，不如先对中国智库领域的发展做一些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排名也不迟。

**李国强：**建立科学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和方法，应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要把正确的评价导向和科学的评价方法相结合，发挥好评价评估的导向性、促进性和示范性作用；方法上，要把问卷调查评价与实地走访调查相结合，与专业权威机构和人士评价相结合；智库专业化评估与社会多元主体评价相结合；要把决策咨询过程与决策咨询结果的质量、是否“管用”相结合，智库评价与决策者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产出与成效、规模与质量、特色与专业、开放与合作、自主研究与组织研究相结合。

## 5. 提高智库研究质量有哪些可循之路？

**主持人：**归根结底，智库要想强健自身，必须推动智库研究内容创新，拿出过硬的思想产品、战略设计。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各位专家支支招。

**薛澜：**从长远的角度看，智库发展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智库在所选择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任何一个智库都不能包打天下，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的领域中，必须有一流的政策研究学者，有长期系统的数据积累，有独特的分析方法，有稳定的高质量的产出。其次，是智库的制度建设。在林林总总的智库中，真正经久不衰的百年老店，往往是那些在制度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的智库。如美国著名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与政策制定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又如布鲁金斯学会在价值选择上，始终坚守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座右铭，使得其研究成果始终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只有把专业的研究能力与可持续的科学管理机制有机结合，才能打造智库中的常青树。

**李国强：**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促进我国智库改革创新。一是促进官方智库加快转型发展，着重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二是规范、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着重为其提供研究成果报送的渠道和参与平台；三是加强智库宏观管理，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上对各级各类智库资源进行有效组合和创新管理。例如，可使用国家专题课题组这一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在选题上统筹协调，从相关部门、单位抽调专家，集中力量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增强智库研究的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

**王辉耀：**智库存在的本质意义是影响公共政策。智力资本、独立性、影响力是智库创新运营的三个原则。基于这三个原则进行创新，需要借助五种能力的支撑，我将其总结为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一是研究支撑力。这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增强对政策的影响力，并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提供支撑。二是思想创新力。这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传播力。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四是国际输出力。通过这一能力影响国际舆论，更好地助力中国发展。五是政策影响力。这

是五力作用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是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

同时，中国社会智库自身的创新任重道远。社会智库运营创新关乎中国公共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构建与形成。作为社会智库，我们当勉力前行，率先探索。

**李刚：**去虚火、强筋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智库唯一正确的选择。智库不要妄自菲薄，要自信，要认准自己的时代使命。这是一个有理论、有思想的时代，但是理论和思想要变成战略和政策，离不开智库的战略分析和政策分析工作，智库作为专业的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问题是，智库出品的是“伪知识”还是“真知识”？要出真知识，智库必须练好内功，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练好内功，智库才有可能出真知识，管用的知识。

智库要有自己的专业伦理。学风是智库专业伦理建设的核心，有好学风才会有好的政策分析。

智库人才从哪里来？智库要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要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我国现有学科中，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学科都没有系统培养智库政策分析人才的具体指向。如果大学不能系统培养政策分析人才，我们只能靠师父带徒弟的中世纪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智库人才。

智库的学术体系也非常重要。学术体系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学术制度（学会、期刊、年会）等行业交流平台，以及智库内部的学术质量控制制度等；二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经典案例、分析工具等方法论。建立学术体系是智库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

就国家层面而言，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应主动培养和利用智库，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来源：《光明日报》）

#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聚焦“数字化时代的大学未来”

## 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综述】互联网深深地改变着整个世界，也深深地影响着高等教育。信息化、数字化给高等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汹涌的信息化与数字化，高等教育如何应对？这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实践者们不断思考的命题。

作为一次国内外高校的对话平台，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聚焦“数字化时代的大学未来”这一主题，凝聚高等教育转型与发展的共识。正如天津大学校长助理胡文平所言：“这个平台让我们彼此分享、彼此欣赏，然后协同发展。”

## 面对信息挑战，高校须开门办学加快转型

中国高校面临怎样的形势？校长们的共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些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现有 2550 多所高等学校，有 3350 多万在校大学生，其规模居于世界前列。但另一方面，这些成绩多是在最近这二十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中形成的，其基础尚为薄弱。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所说：“很多学校处在初创期或者正走在从初创期向成熟期过渡的路上。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是非常稚嫩的。”面对现在的信息化社会，他提到：“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化的时代，信息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办现代化的教育，这是对我们的新挑战。”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深感大学危机，他说：“由于信息化技术的到来，整个全球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大学不再是社会的引领者，不再是知识供给的唯一主体，这就给我们大学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

吉林大学副校长郑伟涛说：“数字化时代的的确确给未来中国大学治理带来了变革和机遇。”

面对挑战，王树国的解决之道是：大学必须要摒弃过去的象牙塔思维，打开校门和社会融为一体，知道社会未来的需求所在，并根据社会的需求来确定自己的办学定位。所以大学未来在 21 世纪不是闭门大学，而是要和社会融为一体，真正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信息化，开门办学成为高校校长们的共识。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说：“未来大学一定要开放办学，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

对于信息化的挑战，校长们更多地从大学办学的逻辑起点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需用现代信息手段推动高校加快转型。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变迁和高等教育传统惯性之间形成的“文化时差”，将因技术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而愈演愈烈。高等教育唯有及时调整“文化时差”，才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他认为，高校要在教育理念、治理结构和教育范式三个方面进行革新和再造，这三方面的再造都是因为数字化而引发的颠覆性的大学革命。

徐飞的观点引来众多校长的高度认同。郑伟涛也认为，信息化时代中国大学应该做到变革和创新，首先就是要实现大学治理观念的转变，将互联网要素融入大学治理改革的全过程。

### **国际化，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必由之路**

开门办学，已成为高校校长们的共识。对于如何开门办学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要，世界各高校行之有效的实践是推动高校的国际化，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用多种方式的联合办学来适应社会的需求。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徐幼麟说：“教学、研究、创新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大学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来实现这三大目标。”

中国高校校长们都在急迫地推动高校的国际化。浙江大学副校长宋永华认为，在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双一流”进程中，要实行开放的教育，而开放的教育就是要建设国际化的大学，国际化会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说：“国际一流大学一

定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学，浙江大学正建设新的国际校区来支撑学校的国际化。”

毋庸讳言，国际化对高校及学生都有重要意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副校长 Lee Bird 认为，“国际合作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球性的思维，让他们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通过国际旅行、数字化交流方式让学生真正去世界各地走访来获取信息。该校已同中国高校签署了 2+2 本科生培养等项目。

此外，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也正加快国际化进程。渥太华大学约 10% 的在校生为国际学生，学校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教学，有很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在开展。加拿大也正通过奖学金等方式，每年鼓励 5 万名加拿大学生到国外去学习。

中国高校也正在加快国际化进程。北京交通大学这几年把“引进来”“走出去”结合起来，建立了威海国际化校区、中俄交通学院及国际交流平台，加快了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大连交通大学的探索极具借鉴意义。校长李学伟介绍，学校建设了专门的国际化人才基地，与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等签订了中俄轨道交通学院，共同培养人才。吉林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等高校都纷纷分享自己的国际化经验。

不过，校长们也认识到，国际化也要“坚守初心”“坚持自我”。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认为，与国际合作要选择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的、基础性的问题为选题，从而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特别强调要坚守大学之本，让国际化、信息化根植于我们自身的政治文化土壤中。

### **数字化，推动全球高校合作**

在诸多大学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多元的教学方式中，校长们认为，数字化让不同国家大学生在不同文化间实现有效连接和沟通，是人才培养

转型的推动力量。MOOCs（慕课）、Coursera（免费在线课程联盟）等在线教育方式被校长们屡屡提及。

数字化教学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更重要的是在弥补学生的知识缺口，在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方面作用巨大。俄罗斯乌拉尔国立交通大学副校长 Bushuev Sergei 以俄罗斯情况为例谈道：俄罗斯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正在进行再教育，或者说是第二学位的教育。这些成人学生可以使用网络，进行远程学习，费用则更便宜。学校提供的在线课程都来自于俄罗斯的领先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利用新的信息技术让师生寻求到更好的学习方式。副校长 Freddy Boey 认为，借助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会带给师生更具互动性的、激励性的学习，提升了教学的效率。

以色列理工大学副校长 Paul David Feigin 在演讲时强调，他们将网上学习以及 MOOCs 学习的创新作为大学的战略性计划，同时通过这些手段进一步提升与中国进行的教学合作的水平。MOOCs 展现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增进才能。

比利时鲁汶大学工学院院长 Kris Willems 说：“开放性的课程，或者是在线课程，都能对我们的发展产生有益影响。但实际上，在线课程使得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结构，以及知识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学习应该是一种更高效的学习。”

数字化时代给中国高校带来的是由线性治理为主转向强调网络治理。郑伟涛副校长认为，应将互联网要素融入大学治理改革的全过程，探索基于信息数字技术的大学治理过程公开与协商机制，同时要全面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构筑教育网络与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体系。

西南交大校长徐飞说，今天的课堂已经大大扩展，在线学习与线下学习，自主学习与集体学习，课堂学习与自主探究，这些都要有机结合起来。（来源：《光明日报》）

## 【校内传真】

### 我校 17 位教师入选省级人才项目

日前，福建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6 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入选者名单。我校 8 位教师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田晖、数学科学学院汤龙坤、建筑学院姚敏峰、制造工程研究院黄国钦、工商管理学院李海林、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志强、法学院陈斌彬、文学院吕晓玲；9 位教师入选“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分别是：建筑学院欧达毅、数学科学学院汪东树、机电及自动化学院言兰、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东旭、土木工程学院蔡燕燕、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花威、经济与金融学院魏清达、工商管理学院邓晓懿、外国语学院万婉。（华大新闻网）

### “经典诠释与政治哲学”2016 年全国博士后论坛在我校举办

5 月 28-29 日，“经典诠释与政治哲学”——2016 年全国博士后论坛在我校厦门校区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我校承办。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等多家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的 40 余位中青年学者与会。论坛以“经典诠释与政治哲学”为主题，共收到 40 余篇会议论文，并分为中国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子论题展开讨论。（华大新闻网）

### 我校学子在多项赛事中获佳绩

5 月 28 日，由科技部主办的以“创新引领，共享发展”为主题的 2016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广东科技中心落下帷幕。华侨大学广播台（厦门校区）播音部部长、我校华文学院学生胡梓梁获大赛一等奖，并被授予“全国十佳科普使者”称号。

5月28-29日，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福建省教育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集美大学、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承办的第十六届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会在厦门集美举行。我校学子于佳（马克思主义学院）、黎炳男（材料学院）获得比赛一等奖，陈炳杏（马克思主义学院）获二等奖，王德怜（材料学院）获三等奖。（华大新闻网）

---

本期送：校领导，纪委，党委各部（室），工会、团委，各学院、处（室）、直属单位。

---

网址：<http://fzghc.hqu.edu.cn/>

邮箱：[hqdxfgzhc@163.com](mailto:hqdxfgzhc@163.com)

---

**内部资料 妥善保存**

**责任编辑：张丽萍**